

艾芜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艾芜短篇小说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艾芜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插页 3

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1月北京第2版

197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1175 定价 0.84 元



作者像

Amogh 10

題
二

①

都市的賣油娘子

母子

父

A071772

賣油娘子水梳頭，這是一句極其流行的俗
話。意思是說，賣油人的娘子，梳不得用油梳
頭，只拿盥水來潤頭髮。也就是說，一些本
本生意的人，以友一般不苦，總是拿好的去供
給別人，壞的留給自己。這是不苦，但是現代社會生活的起
來，逼著人不得不這樣虐待自己，不如此，
就不敢生活下去。
去長生是个挑水的苦力，自然也得服從這

作者手迹

重 版 题 记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窃取国家部分权力，用法西斯的手段，统治文化界，约有十年，我没有出过一本书，而且各地图书馆都把我的书封存起来，不准借阅。我自己本人，失掉自由，长达四年之久。一九七二年三月得到解放，我觉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发表三十周年的时候，文艺工作者应该写出作品来表示纪念。一九七二年七月，我便去大小凉山，了解彝族解放前后的生活，约有两个月，回来写了一个中篇的一部分。恰好《四川文艺》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创刊，我应编者的要求，把写好的一部分，作为短篇小说发表，题名《高高的山上》。这可闯祸了！“四人帮”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后来改为文化部）在他们出的内部刊物简报第三期上，就加以攻击，四川的“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受“四人帮”影响的，就在大会小会，大字报小字报上摇旗呐喊，随声附和，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四川的帮派体系土崩瓦解，我和全国被压迫的文艺工作者一样，再次得到解放，决定把有生之年献给党，献给人民，在文艺工作上，作出更大的努力。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通知我，要把文化大革命前出的《艾芜选集》，再行印出，这对我来说，可算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在“四人帮”未粉碎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趁此再版的机会，又选进四个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太原船上》，特别要讲一讲。我一九三一年春天，被统治缅甸的英帝国主义者押送回国，到香港还关了一夜，然后释放。一九三一年冬天，我和沙汀同志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有关题材的问题（鲁迅先生的回信和我们去的信，都收在鲁迅先生的《二心集》内），得到回信之后，又把我们写的小说，送给鲁迅先生请教。我寄了一篇刚写成的小说，就是今天要选入集子的《太原船上》。当时鲁迅先生回我和沙汀同志的信上，说《太原船上》写得朴实，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由于内容关系，刊物不好登载，我也没有设法投出。稿子便由沙汀同志保存下来，经过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的逃难，一九三三年又遭到了国民党的逮捕（我去工厂会工人，因他们被捕，我也被守候在那里的侦探抓了；又因为他们无人证物证，得到无罪释放，我也获得自由），都没有牵连到稿子，免遭遗失，这是不能不感谢沙汀同志的。后来听说沙汀同志将此稿交一家刊物发表。不幸这份刊物一出版，即遭封闭，连我自己也没有看见。一九五三年我在鞍山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要我编选自己的小说集，我也想到了《太原船上》，但没法找到，也就算了。由鞍山去北京居住，不知是哪一年，听说上海曾重印一批三十年代的文艺刊物，并在全国文联大楼展览，其中就有登载《太原船上》的《文艺新地》，作者署名乔诚，这是沙汀同志取的笔名。我要蕾嘉同志帮我抄录下来。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窃取了文化大权，进行法西斯专政，我遭到几次抄家，幸好专案组把这篇小说同其它稿子保存下来，还给了我。现将它编入再行出版的小说集中。这是

对鲁迅先生表示一种尊敬和纪念。

我还要说一点，鲁迅先生不仅在我的创作工作中，给予了指示和鼓励，还在我的生活困难中，也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大力援助。前面讲过一九三三年春天，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的逮捕，伪公安局拘押我两个多月，又移苏州伪高等法院的第三监狱关了四个多月。左联为我请史良律师出庭辩护，鲁迅先生并捐助五十元，作为律师的费用，这不只是经济上的援助而已，而且是政治上得到鲁迅先生的信任。我出狱后，左联的同志告诉我这一事情，我即去信向鲁迅先生表示感谢。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逝世后，我曾写文哀悼，也郑重地提起这件帮助我的事情。（发表在《光明》半月刊上，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回忆鲁迅》一书，收入过这一篇文章。）

我对鲁迅先生一直是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的，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有人贴大字报，说我围攻过鲁迅先生，证据就是我在三十年代赞成过国防文学。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还有人向“四人帮”告黑状，说我赞成国防文学，围攻过鲁迅先生。对于这件事情，不能不趁此机会，说个明白。只就我现在能够搜集到的材料看来，一九三六年五月《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是人们第一次见到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从此引起了争论。例如艾思奇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的《文学界》上，发表一篇文章《新的形势和文学的任务》，就说：“为什么我们要赞同国防文学的口号，而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恰当？因为这一个口号用在现阶段里是太狭隘了。提出这口号的胡风先生，是把着眼点完全放在‘劳苦大众’上面，

而忽视了在新的形势下……”显然两个口号开始的争论，是针对胡风的，同鲁迅先生没有一点关系。当时鲁迅先生对两个口号是怎样的态度呢？就在发表艾思奇文章的同一期《文学界》上，登载鲁迅先生《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O.V. 笔录）一文说：“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的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机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混乱。”这里可以明白地看出鲁迅先生并没有反对“国防文学”，倒是表示赞成，而且当成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总的口号之下，随机应变的具体口号。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的编辑，要我写文章对“国防文学”表示态度。我就写了一篇短文《关于国防文学》，表示赞成。我在文章的开始，这样说的：“我以为口号并非永久不变的，而是在某一时期取其能号召大众切合现实就对。”这就是含有鲁迅先生说的随机应变的意思。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界》八月出版的那一期上。

鲁迅先生《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是在八月《作家》上发表的。到这个时候，我的有关国防文学的文章已经发表了，才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先生委托胡风提的。尽管鲁迅先生明确说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他提的，又对“国防文学”加以批评，但还是肯定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该并存。“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

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从鲁迅先生发表这封公开信之前，以及以后，我也没有片语只字，争论“国防文学”的含义问题，更没有参加两个口号是否正确的争论。说我反对鲁迅先生而且还进行围攻，真不知从何处说起。若说，只要一赞成“国防文学”，就是反对而又围攻鲁迅先生，那么鲁迅先生也赞成“国防文学”，那岂不是他老人家也反对而又围攻他自己么？天地间有这样可笑的逻辑吗？

“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伙同卖国贼林彪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说三十年代中期，“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看来鲁迅先生曾经加以肯定的，两个可以并存的口号，到了“四人帮”和林彪眼里，便变成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了。而且把鲁迅先生的思想，也搞成了大有问题，无产阶级的口号，和资产阶级的口号，可以合在一道使用，不是有些“混乱”么？

有人附和“四人帮”的观点，说是当时提出“国防文学”，就是保卫蒋介石匪帮统治的国家，为蒋介石匪帮卖力，站在蒋介石匪帮一道的。这就是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封建社会里的人，犹有爱国思想，我们连他们也不如么？蒋介石匪帮的卖国政府，是窃取北伐革命的果实之后，

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东西，中国人民早就反对它的。何况它还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出卖了东北四省，又在出卖华北，中国人民痛恨极了，但并不因为有蒋介石匪帮政府的存在，就连这个中国人民相依为命的国家，也不爱了。人民还没有愚蠢到这步田地！

当时能够保卫国家的，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因此共产党顺应人民的心愿，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宣言担任起抗日救国的重大任务，并要改组蒋介石匪帮的卖国政府，成立真正抗日的“国防政府”，这不是把政府和国家分得清清楚楚的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这篇光辉的文章中提出：“在坚持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其办法中的第六项，是“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又指出蒋介石匪帮的政府，“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性的政府，而是一个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毛主席在这里讲的“国防政府”“国防教育”，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提出的么？又讲“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这同提倡“国防文学”有什么差别呢？“四人帮”诬蔑“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完全是在反对毛主席的。

江青他们又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王明提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上，这个口号是从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

那里来的，连苏联，自己也提过“国防文学”的口号。王明不过作过传达而已。至于王明的机会主义，则有两种，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界线在哪里呢？毛主席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说：“（十七）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芦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十八）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芦沟桥事变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而“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约在一九三六年，或更前一点，哪里说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呢？关于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这是毛主席英明地指出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在芦沟桥事变以后，而不是在芦沟桥事变以前。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处处使用各种阴谋诡计，玩弄各种欺骗手法，在各方面反对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显然要通过搞阴谋文艺，为篡党夺权打开缺口，开辟道路，他们用心的阴谋恶毒，犯的罪行，是非常罕见的，必须尽量揭发，大事铲除除根。我在这里，只就我所知道的一点，写在这里，辨明是非，作为这本小说的重版题记，希望读者指教。

1978年1月17日于成都。

序

年轻时候，五四运动给我的影响是不小的。虽然那时候我还是小学生，在四川新繁县的高级小学读书，看报纸和杂志的能力很低，不懂的地方很多，但却有一股勇气，也可说是傻气吧，总是捧着《新潮》、《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国》来读，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管白费多少力量。而且一了解了，即使是了解错了，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就想变成行动。知道世界上已经建立起工人当家作主的政府。看了蔡元培的《劳工神圣》以及李大钊赞美劳工的文章，寒暑假回家的时候，就不要人挑衣箱被包，甘愿自己拿肩膀去承担起，辛苦走二十里路，觉得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尽管国文老师要学生做文言文，但我不顾他的反对，偏要写白话文去缴卷。另外，则又起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想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去读书，尤其想进北京大学。不管作得到作不到，这个美梦一直作得很香的。

我的父亲把祖父分给他的十多亩田都卖了，专靠教初级小学每月得来的八元钱来养家，哪能供给一个儿子读大学？中学都不可能！幸好公费的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帮助了我，但这个学校并不使我满意，因为那里面连新潮流的一点泡沫都找不着。而且读大学的美梦也渐自破灭了，主要是认清了经济上实在不可能。但我的勇气和傻气，反而有增无已。

我要凭我的双手、我的劳力走到世界上去。就由于这种对劳工神圣的简单认识，并相信半工半读可以作到，使用一种豪爽和愉快的心情，坦然接受着一个劳动者在旧社会里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难。我六年没有同我家通过信，也没有和同学通过信，我决心跟我那出身的社会割断了联系，就这样投进了人生的大海。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落在云南昆明的街上，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这是我最难忘的一课，也是任何大学所不能授予的一课。但我把这一课写成文字的时候，已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了。因为一九二五年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作文学工作者，只想在那个叫人活不下去的社会里顽强地生活下去，并要工作、读书、学习，把社会当成一个大学。

我在云南昆明的红十字会作过一年半的杂役。在云南西部的群山中流浪过一个时期。在滇缅界上景颇族人居的山——一般汉人把它叫作野人山——里，替路边汉人开设的马店打扫过五六个月的马粪。在缅甸仰光帮中国和尚煮过一个时期的饭。又流浪到过马来亚和新加坡。我最初写作的材料，就从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生活里汲取来的。

选在这个集子里的短篇，都是一九三一年以后写成的。但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即在流浪期间也偷闲写过新诗和小说。在昆明的文艺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在仰光无以为生的时候，也靠投稿到华侨报纸的副刊上生活过一个时期。这也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深深爱好白话文学，即在无法写作的条件下，也忍不住不写。我记得在景颇族居住的山中，结束了五六个月的辛苦工作，走下缅甸的八莫平原，住在伊洛瓦底江边一

家苦力店里的时候，晚上点起一枝蜡烛，就伏在地板上，高高兴兴地写起新诗来了。这是流浪期间最难忘的一夜，也是最快乐的一夜。

年轻时候，真是有着无穷无尽的勇气。我现在还要保持那种勇气，好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欢欣鼓舞地来迎接这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并勇敢地投到人生的大海，体验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努力用文艺来表现我们伟大的、建设新中国的劳动人民。

1953年6月10日，鞍山。

目 次

重版题记	1
序	1
人生哲学的一课	1
左手行礼的兵士	21
山峡中	28
流浪人	46
乌鸦之歌	69
山中送客记	78
伙伴	90
欧洲的风	101
海岛上	125
我的爱人	140
印度洋风土画	145
太原船上	166
荣归	174
两个伤兵	184
意外	191

黄昏	204
秋收	215
回家	248
火车上	280
猪	293
都市的忧郁	319
石膏嫂子	343
流离	365
暮夜行	379
后记	400